

《棒！少年》是一部纪录片，除了“棒”，我不知还能说什么。这群被迫打棒球的孩子，太有生命力了，太有趣了。

孩子们击打的是球，更是他们别无选择的人生。顺带着，也把我渐趋平缓的内心击打得阵阵颤栗。

热血难抑，是所有体育类型片都可以轻易引起的观看情绪。但《棒！》不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用胜利取悦观众”的作品，它更侧重于展现失败。

导演许慧晶既客观地记录了以“马虎、小双”为主的一群穷苦孩子的棒球之路，同时又不闪避地呈现出主观的创作情感，他想让更多“看见”这群孩子。

马虎因为顽劣，被罚独守营地，片子边展示他的队友们在广东中山球场上比赛，边展示他一个人发狠地挥着球棒的画面；马虎被接到中山球场，兴冲冲上场结果被“三振出局”，镜头一边展现教练以马虎错误为例向队员们训话，要求大家“变成一匹狼”，一边展现马虎对着镜头骂骂咧咧，说“我就是条流浪狗”；马虎一个人在黑夜的微光中走着，唱着“妈妈呀妈妈，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小双一个人绕着家乡的古松树，最后将一枝松叶塞进树洞，唯美的画面中，这个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身子太小差点被埋土里的苦孩子，流露出乡土气的忧郁。

还有很多这样的蒙太奇手法，确实不像纪录片，但记录的都是无比真实的孩子状态。

以马虎为首的这群孩子，是典型的“野孩子”。不是被父母遗弃，就是父母离异无人看管，甚或父母双亡。以张锦新、孙岭峰为负责人的棒球爱心基地，接纳了他们，训练他们。孩子们接受的是“别无选择”的教育，成为职业棒球队员或者棒球事业从业者，或者，重新成为“野孩子”。

带好一个男孩，让他养成刚柔并济，温文尔雅，知恩图报，发愤图强等品质多耗心力；基地里这么一堆野孩子，教练们这边还没骂完，那边可能就打成一团。他们还得想着让孩子不被驱赶，有学可上，有饭可吃。太难了！

但他们对一群小孩的付出，回报也是巨大的。这些孩子，无论成不成才，都把他们当成了精神父亲，可以看到他们之间超越血缘的强力纽带，是怎么都剪不断的。看见孩子的内心，对成人是种救赎。

有爹妈疼爱，自然会关心他人。像根野草的孩子，打人骂人捣乱，都是掩饰自卑，演出强大。总是被打的

## 唉，带好一个男孩

林立

如果说，在子女教育上也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梁启超无疑是百年来最成功的“家教大师”了（恐怕没有之一）。他与一妻一妾共育有十四个子女，除了五个早夭的不算，成人者四女五男，长大后则个个学有所成，每位都成了一“家”。如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鼎鼎大名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参加过淞沪会战，惜英年而因病逝世；二女梁思庄，国内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后成为社会活动家；还有早年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战的四女梁思宁以及后成为航天火箭专家的幼子梁思礼。这样的“成功率”在家庭教育史上大

概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考古学家梁思永，在一九四八年就入选为我国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再加上后来火箭专家梁思礼于九十年代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家子女一门才俊三院士，其风光之高耀真是罕有其匹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往往扮演了一个严父的角色，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平日不苟言笑，对子女从不轻易褒扬，把父爱深埋于心。或许傅雷就是这样的父亲，而梁启超却是例外。尽管梁启超是中国科举制走出的士子，但他的身上却毫无旧文人的酸腐气，他思想非常开明，对子女的爱喜欢直截表达，这一点与西方人文化很接近，总是表扬鼓励为主，把自己的想

法不断地与孩子们交流，没有辈分上的尊卑，视子女为自己最亲近的朋友。

晚年的梁启超在政界经历了几多沉浮后，终于放弃了政治，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心治学著述，并先后于清华、南开等学府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当时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便

## 最成功的“家教大师”

管继平

是名冠其首，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著述之余，梁启超对书法也极有研究。《饮冰室全集》中就有一篇万余字的《书法指导》，乃根据他于 1926 年应邀为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的讲演记录而成，他在文中首先就表明“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而且写字

“可以独乐”，不似喝酒、打牌、唱歌听戏须“聚合多人”，所以他认为：“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其实梁启超也很喜欢娱乐，据说他玩牌也是一把好手，他曾有句名言甚妙：“只有读书可使我忘记麻将，也只有麻将可使我忘记读书。”若由此类推，想必写字大概也能使他忘记麻将吧。

梁启超曾说学书“应从方正严整入手为是，无论做人做事，都要砥砺廉隅，竖起脊梁，显出骨鲠才好”，从写字说到做人，其理大致相通。梁氏的为人做派也同样是内圆外方，耿直率真，他才华横溢，学问滔天，但从来不拘泥遮掩，人谓其是“率真”，我看他是“真师”！

记得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梁启超先生于清华大学

演讲的文章中，有一段描写颇为精彩：……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然后他又写道：他（梁启超）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几句话，将梁启超先生的第一印象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两句简短的开场白，一进一出，既自谦又自负。不过，照在我看来，梁启超说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自负。当然，他也完全有资格这样自负。

有语谓聪明过头，通常指的是算计太多，结果反而受累。《红楼梦》有句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当我们说某某人聪明过头时，通常带有贬义的色彩。

其实，聪明永远不会过头，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计算机芯片、人工智能等产品日新月异，足以证明人类具有无可比拟的聪明。通常说聪明过头，其实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聪明没有伴以智慧，或者说是缺乏智力判断，最聪明的人可能就是铸成最大错误的人。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区别聪明和智慧：一辆马力大的跑车驰骋飞快，足以保证你在一天内玩转上海，但是大排气量的马达不足以保证你能安全地玩上海，如果开车的人不懂交通法规，不谙安全开车，那么上路不多久，肯定会吃到罚单，甚至命丧黄泉。报章曾有过报道，说是美国很早就有专家认为“千禧一代”（24-39 岁）头脑聪明，但容易犯错，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那些所谓专家、所谓学者的经济主张几乎使得人人遭劫，美国才开始强调投资理财的判断必须是理性的，要以证据为基础等等。

人们称学习成绩优秀的人为“学霸”，“学霸”者，聪明的人是也。但如果对名牌大学的“学霸”作一调查就可以发现，缺少基本生活常识的人大有人在。我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被公认为数学奇才，1977 年恢复高考后考进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大学，后来在研究所工作。但是，他连料理自己基本生活的能力也不具备，不到 70 岁就被家人送进了养老院，实在令人扼腕。

这就是聪明的圈套：学习成绩优秀的人，往往不太容易听取别人的忠告，也不太会从自己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有多个学位的人面对问题往往会固守自己的偏见，其后果不仅仅是个人受累，也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更有甚者，那些中招聪明圈套的人，往往善于用各种理由来使自己的中招合理化，甚至倚重迷信八卦来为自己辩解。一位朋友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攒了些钱回上海买房子、买股票，结果屡屡碰壁，却迷恋上算命、八字等，最近他说正在思考写一本书，用命运的理论来阐述投资理财。其实，他忽视了自己判断力上的问题，充其量是用一种偏见来替换另一种偏见而已。

摆脱聪明的圈套，不需要灵丹妙药。谦卑一点看待自己，放下身段待人，广开言路，容忍反对的意见等等，这些看似常识，却是自以为聪明的人最难做到的。我注意到有一档电视节目谈及夫妻间发生激烈争吵，节目主持人没有作直接的调解，而是要双方放下架子，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发生冲突的原因，看看自己有没有错误的地方，结果是不仅冲突迎刃而解了，夫妻还增加了互信和亲密感。

聪明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而智慧是可以学会的。问题是当今的社会依然鼓励逞能，强势，而比较慢条斯理、比较周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受重视。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提出问题要学生举手回答，嗣后，老师往往不忘表扬第一位举手的学生。据我所知，这种把速度、把反应快奉若神明的教育方式，有些老师还在运用。过于急功近利，就会看重速度。我们往往说此人有小聪明而没有大聪明，就是指此人比较功利而缺乏智慧。



边看边聊

## 聪明的圈套

周炳揆



## 浦江渡轮

吕庆

现代化的大桥下  
还有你憨厚的身影  
汽笛，奏着东方情歌  
江水，拍着船帮低吟

你横着身子靠岸离岸  
看得出早已不再年轻  
唯有穿过江心的那刻  
才像水鸟一样轻盈

这时，你就是锃亮的  
银梭  
在金色的江面往返穿行  
编织新上海今天的惊喜

一片彩霞一片高楼  
一片鸟影

看到他的成长，我深叹，“野孩子”才是好孩子。他们不得不早熟，失去了孩子应有的温暖。但当他们被及时地抱住，那野狗般的眼神逐渐闪出极强大的人性。他们很早就度过了普通孩子的懵懂期、叛逆期，他们的“好”，在于他们的“懂”。懂事的孩子，总是会被大人心疼的。尽管他们懂得太早了些。

看到他的成长，我深叹，“野孩子”才是好孩子。他们不得不早熟，失去了孩子应有的温暖。但当他们被及时地抱住，那野狗般的眼神逐渐闪出极强大的人性。他们很早就度过了普通孩子的懵懂期、叛逆期，他们的“好”，在于他们的“懂”。懂事的孩子，总是会被大人心疼的。尽管他们懂得太早了些。

上海这座城市的奇妙在于：不管生活节奏多快、压力多大、成本多高，依然能容纳梦想。

当我做起那个梦时，来上海还没几年，刚在老式小区买了五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和父母挤在一起，存款没多少，事业刚起步。而那个风光旖旎的梦竟然开始了。

那是一场文学梦，跟

## 梦想让我如此幸福

李佳

衣、食、住、行都无关。细究起来，其实它在我很小时就萌芽了，只是未曾壮大，许多年来，它又飘飘摇摇地、不知去了何方。

而让我找回这个梦的，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之一——上海图书馆。一次偶然，我伴着朋友参加“上图讲座”，之后便爱上了，成为那里的“常客”。一年后，在一次“讲座沙龙”活动后，我兴奋难眠，禁不住提笔写了一篇小文，发给上图讲座部，想不到，居然得到老师的回信赞扬，说为活动“增添了一抹馨香”，小文被讲座刊物收录。于此，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写的。

然而，“能写”与“会写”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每一种梦想，在最初都很脆弱；而若要梦想成真，需要许多支撑它、滋养它的东西。现在回首看，支撑我梦想的，是无比强烈的愿望，和许许多多可爱的人。

曾有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我：“当你的愿望足够强烈，‘上帝’都会帮你。”而这座城市告诉我：当你的愿望足够强烈，便会不知不觉走近或吸引

与自己一样的人。——这大概是上海的“万有引力”定律？

反正，这座城市里的竞争虽激烈，却从不缺平台和机会、温情和包容。

我的社会角色是公务员，做宣传工作。虽然也是“写”，但这种写与文学写作路径不同，几乎南辕北辙，正当我在“路口”徘徊时，迎来了一位真正的作家“师父”。我至今记得，她看着我的“简报体报告文学”语重心长地说：“写人是要让人立在纸上，要写出他的个性。”还记得，她如何带着我采访；记得，她读过多少书；记得，她是如何在繁忙工作之余，安排写作时间的。而这些宝贵的财富，至今依然启发着我、鞭策着我。

后来，我迎来了参加“笔会”的机会，得以认识



山水(中国画)刘亨

更多良师益友，他们的生活各自精彩，又各有笔端风流。得以认识他们，有如倦鸟归林，我的内心世界豁然敞开了，但不愿望更加强烈，而且见贤思齐，又生出更高、更远的目标来。

## 七夕会

几个月后，我拜访沪上一家老牌旅店，在宾馆服务整整 40 年的成敬梓告诉我，他 1980 年进旅店从在餐饮部洗咖啡杯做起，一直做到党支部书记。我坐下时略一回头看一眼出风口，一句话还没说，他便马上让服务员将空调温度调到合适。我心想，这宛如条件反射般的观察力。

他说。我做一辈子酒店服务，所有工作里最难的是去洗一只咖啡杯。可是如果我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说给一个职场的年轻人听，他也未必会明白。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也许反而是太聪明的人不能明白——

每一次烧官保鸡丁，完全不同。所以所有的菜肴里，烧官保鸡丁最难。看似能一下跃过去的地方，简直寸步难行。

周晓敏大高个儿，瘦长条，和我印象里胖胖的厨师都不同。如果不穿这身白色制服，走在路上，我也会猜他是个男篮运动员。他说我也会喜欢运动。每天从家里往返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上下班，他总会提前一站下车，一路跑回家，或者一路跑向酒店。

就这么跑着跑着，一晃 30 多年过去，他从小厨师变成如今梅龙镇的第四代掌门厨师、技术总监。一桌的菜点下去，他都驾轻就熟做出来。如熟悉山路的樵夫，轻松带着我们披荆斩棘穿越树丛，还能得暇一路指点欣赏风景。

周晓敏说起光顾过这家名店的名流：荣毅仁和陈香梅在上海时，都曾在梅龙镇酒家用餐。从业三十多年，现在各路的客人来用餐，不管多大的名头，他都能轻松应对。一桌菜烧好，他坐

在餐桌边加入我们，欣赏自己的作品，整个人放松又自在。

于是我问他，现在，看到客人点什么菜会紧张呢？

我以会是店里传统看家菜比如较为复杂的富贵鱼镶面，又或者是眼下网红餐厅兴起的时髦菜给他带来挑战。没想到他在椅背上重新坐直了说——

我最怕做官保鸡丁。

为什么是官保鸡丁？这道川菜里的入门菜。步骤简单，食材常见，岂不是任何一位厨师，甚至普通人家，都能做出的？我们笑起来，各自都说自己都会做这菜。

周晓敏正色说，学做菜的人，的确上手都能做官保鸡丁。但最难做的也是官保鸡丁。

我想了想说，我记得采访昆

曲大师、国家一级演员蔡正仁时，他说过同样的话。18 岁时，蔡正仁年轻气盛，花了一个星期把昆剧《太白醉酒》学下来，当下觉得，这出戏也不算难。过了二十年，到蔡正仁四十岁那会儿，再演《太白醉酒》，明明还是这些唱词还是这些动作，他在台上忽然觉得浑身难受，当天晚上失眠，起来给老师翁振飞写信。三天后俞老回信到了，他的第一句是，“我终于等到你的一句话。”

蔡正仁当时信里写了什么话呢？蔡正仁说，学艺的感受是“学艺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俞老说，这句话好，等了二十年等到了你自己明白。我问周晓敏，是不是一个道理。周晓敏说，是。每一次烧官保鸡丁，完全不同。简直令人畏惧。

## 最难做的菜

沈轶伦

## 美食